

政府生命周期模型

——对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的重新阐释

魏凤春

(南开大学 经济学系, 天津 300071)

摘要:文章以财政的视角,在一个契约的框架内通过对穷人、富人以及代理人集团博弈的财政过程的描述建立了政府生命周期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重新阐释,得出了公共政策的实质是权利分配、政府通常偏好短期政策操作、公共政策多是“穷则思变”的结果、权威在公共政策施行中起着独特作用的结论。本模型在还原政府行为本来面目的同时,可以扩展到对企业家生命周期和对经济史上制度变迁的研究中。

关键词:政府生命周期模型;财政;公共政策

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5)11-0069-10

一、引言

公共政策研究的核心在于通过对政府适当行为的描述来寻求公共选择的规律。因而,对政府行为本身运行规律的探讨是研究公共政策的应有之义。

但是,对经济学家来讲,公共政策的研究既是挑战,又会遭受挫折。不仅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而且其结果均不符合人们的期望(Daniel W. Bromley, 1989)。亚当斯(Adams, 1896)认为:国家干预的后果是既解放又束缚,既创造又毁灭。对于政府适当行为或者说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的研究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主要围绕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每当现实经济环境发生巨变之后,这一论题就被提出来重新探讨一番,遗憾的是,每次争论非但没有减弱经济学家观点的分歧,而且使得观点愈加迥异。

未能把握政府行为基本运行规律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对这一基本规律的探讨要从决定政府行为的核心要素进行。若认同政府形成是“契约论”的观点^①,那么就认同财政是决定政府行为的核心因素。基本的理由是,在一个委托代理的框架下,政府作为代理人,其收益是由委托人决定的。这些收益是不同利益集团为了享用公共物品而向代理人支付的成本,收益的

收稿日期:2005-08-25

作者简介:魏凤春(1970—),男,山东潍坊人,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博士。

形成过程就是一个财政的过程。基恩·波丁(Jean Bodin)认为:财政手段是政府的神经,伊斯曼德·伯克(Esmund. Burke)坚持“政府的税收就等于政府本身。实际上政府的一切都依赖于它……”的观点。因此,从财政的视角来研究政府的行为将会更好地透视公共政策的基础。

财政是个分配的过程,既是个政治过程,也是个经济过程,它会引发不同利益集团之间权利的重新分配。在一个不完全的合约下,当公共产品的价格越来越高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规模效应将不复存在,个人或者市场将会替代政府来提供公共产品的替代品。当这种价格足够高时,合约的中断便会成为必然,委托人对委托事项的不满意,便会促使代理人的更迭。

通常地,只有当大集团的人均收益难以弥补其成本时,合约才会中断。奥尔森认为,大集团并不代表其谈判实力强,小集团往往因为内部组织的原因可以更好地达成一致。在一个依靠多数票才能继续执政的机制下,大集团的优势非常明显。在一个独裁的体制下,小集团可能会有更强的控制力。长期内大集团成员用脚投票的结果引致财政失败,财政失败意味着政府失败。财政压力周期变动是常态,因而对政府生命周期变动的判断便是顺理成章的。

考虑政府的生命周期,其实是考虑了经济学上讲的一个最古老的时间问题。不考虑时间约束,公共政策的研究便是静态的。在此背景下,政府领导者就会在整个存续期间做出政策选择,而不必考虑该时期是有限的,还是无穷的。预期在无限期内使其效用最大化,政府就可以完全有计划地推行政策,从而进行周而复始的试错行为。事实证明,尽管政府的领导者都喜欢永久执政,但仅是执政者的生物特征就使得这一想法不可能实行。执政的结果是通过垄断一种权力来获得超额的利益,这成为潜在竞争者相机而动的理由。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和更大的空间内,竞争者替代的现象比比皆是。

当新的竞争者出现时,政府必然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进行政策调整,因此,建立在政治周期基础上的宏观经济模型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之间重要的交合点。巴罗(Barro,1973)建立的完全信息的、任期有限的模型,弗雷约翰(Ferejohn,1986)对巴罗模型的改进,以及克雷默(Kramer,1971)关于经济因素对美国国会选举的决定作用的研究,诺德豪斯(Nordhaus,1975)提出的政治经济周期的理论模型,以及塔夫特(Tufte,1978)的研究都证明了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动态的平台上。理想的青春永葆的政府行为的假定应该在公共政策的研究中放弃,代之以政府是有生命周期的假定。

本文在一个委托代理的框架内,以财政的视角构建了政府生命周期模型。将整个社会人口分为三个利益集团:穷人集团、富人集团与政府代理人集团。政府的财政过程是一个不完全合约的执行过程,政府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将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的初始财富转移到政府手中,并且通过转移支付和公共支出的方式将财富转移给不同集团。在这个财政过程中,不同利益集团的

财富发生着变化,并且由于穷人集团与富人集团创新能力与动力的不同增大了初始财富的差异化程度。代理人与不同利益集团的妥协程度对前述过程的影响是加速度的,结果是穷人有创新动力但无创新能力,富人有创新能力但无创新动力,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财政失败导致政府失败。在外部力量的协同下,潜在竞争者以获取超额报酬为动机与旧权威的斗争催化了政府新生命周期的开始。财富的重新分配与创新效果的配合,使得政府财政收入达到最大化。财富分配对创新能力与动力的影响变动,使政府的财政压力随之变动,财政重新走向失败,政府生命重新开始。

本模型是在一个制度变迁的框架下对公共政策理论基础进行的重新阐释。从一个最基本的穷则思变的逻辑出发,透视政府政策的变化,在一个动态的逻辑体系下,对公共政策的实质、政府的行为目标、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短期政策操作与长期制度建设的冲突、权威的作用等等公共政策分析的基础进行了重新解释。目的在于客观地描述政府的行为,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和结果尽最大可能地符合人们的期望。

二、政府生命周期模型

(一)对模型的说明

1. 政府的生命周期是由微观主体决定的。政府作为代理人,其生命是由委托人决定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目标所在。

2.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委托人一致同意的原则难以贯彻。因此,只有部分委托人才具有决定代理人的权利。这样,委托人就分成了几个利益集团。本文假设存在着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穷人是大集团,富人是小集团。

3. 政府的财政压力会引发不同集团对公共产品价格的分歧。极端地讲,当一个集团的心理承受能力与公共品的价格相差很大时,其就会拒绝将个人的权利转移到公共的权利,财政过程将会中断。财政失败是政府失败的充分条件,但并不是必要条件。

4. 信息不对称使得委托代理的契约是不完全的。政府在契约的执行中,虽然随时面对财政的压力,但是只有财政压力足够大时,政府才会失败。财政失败根本上是由经济的停滞决定的。如果考虑到创新是经济增长原动力的话,那么不同集团创新的能力和动力则决定了政府财政能力的大小。

5. 当财政压力导致政府失败后,新的领导者出现,得到新的利益集团的支持后,公共品的价格随之下降,财政压力开始下降。

(二)模型

假设在某一时刻,整个社会的人口为 N ,分为三个集团。穷人集团人数为 N_1 ,富人集团人数为 N_2 ,政府作为一个集团,人数为 N_3 , $N_1 + N_2 + N_3 = N$, $N_1 > N_2 (N_3)$ 。假设穷人集团通过劳动获取社会财富,人均数额为 g_1 。富人集团

通过资本获得财富,人均数额为 g_2 。政府集团通过公共权力获得财富, g_3 可以看作其作为代理人的人均报酬。假设社会总人数不变,各集团的人数也不变,但人们会在不同集团之间转换身份。

我们的模型从对政府财政过程的描述开始。政府集团的人均报酬如果为零,政府生命便将结束,这是基本的逻辑出发点,因为代理人不会免费从事代理工作。整个代理人的报酬总量为 $N_3 g_3$,它是政府从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转移来的财富减去对这两大集团的转移支付、用于公共产品支出的余额。如果一国内部的转移不能满足政府报酬的要求,它还可能从国外借债。

在一个不完全的合约下,政府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获取收入:直接方式和间接方式。合约中完全的部分,如税收可以通过法律强制执行,此为直接方式;而合约中不完全的部分,政府可以通过通货膨胀、铸币税、国债等间接改变其他集团财富的方式取得。不同的集团与政府的谈判结果不同。富人集团因为规模小因而行动的一致性更强,在谈判的过程中可以取得更有利于自己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少交税,另一方面因为其人均财富相对较多,通货膨胀等对其的影响较穷人要小。穷人集团谈判的结果正好相反。政府直接取得财富量占穷人集团与富人集团财富量的比率用 t 表示,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的转移比率分别为 t_1 和 t_2 ,一般可以认为 $t_1 > t_2$ 。政府间接取得的财富量占其他两大集团财富量的比率用 e 表示,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财富因而转移的比率分别为 e_1 和 e_2 ,可以假设 $e_1 > e_2$ 。

同样的道理,政府向两大集团财富转移的量也因为集团不同的谈判实力而有所不同。假设整个的转移量为 V ,其中转移给穷人的单位量为 v_1 ,转移给富人的则为 v_2 ,通常的情况是 $v_1 < v_2$ 。则穷人集团的转移支付量为 $N_1 v_1$,富人集团为 $N_2 v_2$, $N_1 v_1 + N_2 v_2 = V$ 。

政府公共支出的量为 C ,外债为 B_f 。概括地讲,政府财政过程如下:

$$N_3 g_3 = (t_1 + e_1) N_1 g_1 + (t_2 + e_2) N_2 g_2 - (v_1 N_1 + v_2 N_2) - C + B_f$$

财政过程是一个演化的过程,它决定于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创新引发的经济增长的变动。新增财富给穷人和富人带来的边际收益是不一样的,前者高于后者。因此,可以假设穷人创新的动力高于富人。此外,创新是要有能力的,包括财力和人力资本,穷人因财力和人力资本投入不足,因此创新能力不如富人。这里引入了创新系数,穷人的为 α ,富人的为 β , $\alpha > \beta$ ($0 < \alpha < 1$, $0 < \beta < 1$)。财富增加,创新系数可以起到加速数的作用,经济加速增长;财富减少,经济加速下滑。由于 $t_1 > t_2$, $e_1 > e_2$, $v_1 < v_2$,财政过程的结果对于穷人集团来说为财富净流出,对富人集团则为财富净流入。因此,加入了创新系数的影响,穷人集团因为创新能力的下降导致了经济的下滑。富人集团虽然创新能力增强了,但因为其创新动力不足,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放缓。极端地讲,穷人集团导致的经济下滑速度将会快于富人集团导致的经济增长速度。

这一过程长期演化的结果是经济萎缩,财源枯竭,政府集团报酬趋于零。

这是对整个财政过程的描述,是一个静态的分析。上述过程是不断演化的,因而动态的考察会更加符合政府行为的实际形态,将财政过程细分为一个个单独的过程便是合乎逻辑的技术处理。每个财政过程之后,不同集团的财富都会发生变化,因而直接影响到代理人报酬的变化,政府生命动态演化。

前面的综述可以看作是对第一个财政过程的分析(以 $N_3 g_3^1$ 表示)。

$$N_3 g_3^1 = (t_1 + e_1) N_1 g_1^1 + (t_2 + e_2) N_2 g_2^1 - (N_1 v_1 + N_2 v_2) - C + B_f$$

第二个过程(以 $N_3 g_3^2$ 表示),财富将会发生变化。穷人集团的人均财富以 g_1^2 表示,富人集团的人均财富以 g_2^2 表示。则有:

$$g_1^2 = [g_1^1 (1 - t_1 - e_1) + v_1] (1 - \alpha), g_2^2 = [g_2^1 (1 - t_2 - e_2) + v_2] (1 + \beta)$$

假设每个财政过程除转移支付额变动外,其他条件不变。假设对穷人单位转移支付每个财政过程减少 θ ,对富人增加 ϵ ,并且进行 T 期,则有:

$$g_1^T = [g_1^{T-1} (1 - t_1 - e_1) + (v_1 - T\theta + 2\theta)] (1 - \alpha)$$

$$g_2^T = [g_2^{T-1} (1 - t_2 - e_2) + (v_2 + T\epsilon - 2\epsilon)] (1 + \beta)$$

$$N_3 g_3^T = (t_1 + e_1) N_1 g_1^T + (t_2 + e_2) N_2 g_2^T - [N_1 (v_1 - T\theta + \theta) + N_2 (v_2 + T\epsilon - \epsilon)] - C + B_f$$

$$\begin{aligned} &= N_1 g_1^1 (1 - t_1 - e_1)^T (t_1 + e_1) (1 - \alpha)^T \\ &\quad + N_1 v_1 \left[(t_1 + e_1) (1 - \alpha) \frac{1 - (1 - t_1 - e_1)^T (1 - \alpha)^T}{1 - (1 - t_1 - e_1) (1 - \alpha)} - 1 \right] \\ &\quad - N_1 \theta \left[(t_1 + e_1) (1 - \alpha) \frac{1 - (1 - t_1 - e_1)^T (1 - \alpha)^T}{1 - (1 - t_1 - e_1) (1 - \alpha)} (T - 1) - 1 \right] \\ &\quad + N_2 g_2^1 (1 - t_2 - e_2)^T (t_2 + e_2) (1 + \beta)^T \\ &\quad + N_2 v_2 \left[(t_2 + e_2) (1 + \beta) \frac{1 - (1 - t_2 - e_2)^T (1 + \beta)^T}{1 - (1 - t_2 - e_2) (1 + \beta)} - 1 \right] \\ &\quad + N_2 \epsilon \left[(t_2 + e_2) (1 + \beta) \frac{1 - (1 - t_2 - e_2)^T (1 + \beta)^T}{1 - (1 - t_2 - e_2) (1 + \beta)} (T - 1) - 1 \right] \\ &\quad - C + B_f \end{aligned}$$

经济学家习惯的生命周期模型都是考虑行为主体在跨期内的总收益最大化。这里隐含的前提是,行为人至少可以控制自己的生命周期,其所做的是改变生命周期内的消费和储蓄的关系,以平滑自己的消费。

而政府的生命周期特征则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府并不能掌控自己的生命周期,代理人有随时卸任的可能。虽然政府可以通过信息的不完全和内部人控制等手段掩盖财政危机,但仍不能改变财政失败引发政府失败的结局。因此,本模型考虑的就不是一个跨期的模型,而是一个即期演化的模型。

分析前面的通用模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并给出模型的图示(见图1)。

1. 长期内,穷人集团净转移支付为负值,富人集团净转移支付为正值的财政过程的结果是代理人报酬最小化,最终代理人失去存在的理由,政府失

败。对上式求时间无穷大时 g_3 的极限,得到政府报酬最小化的表达式^②:

$$\text{Min}_{T \rightarrow \infty} g_3^T = \frac{N_2}{N_3} \epsilon \left[\frac{(1+\beta)(t_2+e_2)}{1-(1+\beta)(1-t_2-e_2)}(T-1) - 1 \right] - \frac{1}{N_3} C + \frac{1}{N_3} B_f$$

2. 新政府的出现是通过打破制度僵滞状态开始的。通过外部资金支持和内部收入分配,穷人创新能力的提高和正的财富净转移的结果使代理人的报酬达到了最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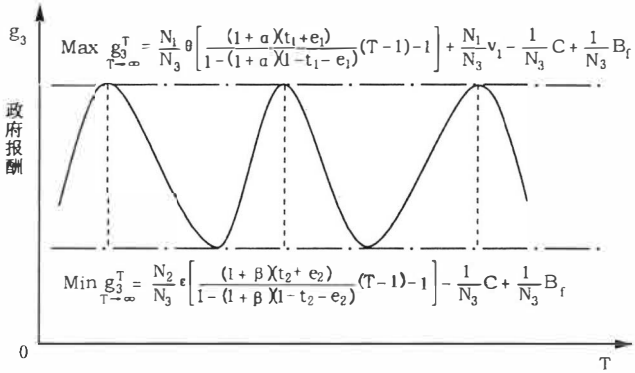


图1 政府生命周期模型

新的政府特别是领导者的出现首先要

解决财政危机问题,在内部资金匮乏的时候,政府首先需要外部资金的支持。新政府与旧政府的最大不同是它将外部资金回报的要求与强行转移富人集团的财富结合在一起。富人的财富一部分抵押给国外资金,另一部分则转移给穷人集团。于是,穷人的创新能力在创新加速数的作用下促进了财富的增加,代理人的报酬随之增加。经过一个较长的时间后,达到最大值。

将前面对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财富净转移的过程反过来考虑。穷人集团净财富增加,富人集团净财富减少。穷人集团创新能力提升速度高于富人集团。相应地,政府直接的收入和间接的收入、转移支付的初始值和变化值都发生反方向的变化。为了简化,假设保持原来的数值。

假若政府持续时期仍然为 T ,则基于穷人创新的扩张效应,政府报酬最大化为^③:

$$\text{Max}_{T \rightarrow \infty} g_3^T = \frac{N_1}{N_3} \theta \left[\frac{(1+\alpha)(t_1+e_1)}{1-(1+\alpha)(1-t_1-e_1)}(T-1) - 1 \right] + \frac{N_1}{N_3} v_1 - \frac{1}{N_3} C + \frac{1}{N_3} B_f$$

3. 当富人集团经历了政府失败过程中与穷人相同的命运之后,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易位。制度变迁重新开始,政府生命周期循环往复。

4. 政府从失败到重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也存在着巨大的收益,这为具备创新精神的权威的出现提供了舞台。权威在其生命周期内,随着财政压力的变化,偏好随之变动。

三、对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的重新阐释

通过对政府生命周期模型的解读,可以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阐释。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公共政策的实质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进而引发权利的变动

在政府生命周期模型中,政府生存的惟一理由是获得集团报酬。而集团报酬的获取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是不同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穷人集团、富人集团与政府代理人集团初始财富的不同决定了各自博弈的地位,也就是公共选择中的投票权。在长期内不同利益集团创新能力与创新动力的不同影响到经济增长,从而影响到代理人的报酬。代理人报酬最小化意味着政府的失败,代理人报酬最大化表明政府获得了新生。公共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权利的分配影响不同利益集团的创新能力,从而使政府的报酬尽可能地最大化。好的公共政策是使得大集团的创新能力足以保证政府报酬的最大化。如果一种政策的结果使得小集团财富最大化,从长期来看,这是一种失败的政策。

坚持公共政策的实质是权利分配的结论可以使得主流经济学对公共政策,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从单纯的供给与需求的真空中走出来,从而进入一个真实的世界。从这个视角出发,则可以认为对公共政策的批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因为批评者总是可以划入一个利益集团,公共政策总是会触动人们的利益。税收、转移支付等对人们利益的影响是直接的,而铸币税、国债、垄断权的转让等的影响是间接的,在一个不完全合约的框架下,这都可以视为一种权利的重新分配。公共政策中的利益冲突不仅存在于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而且存在于政府集团内部。政府报酬短期与长期最大化的冲突直接决定了公共政策短期与长期的矛盾。

(二)偏好短期报酬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常态

在青春永葆的假定中,政府被认为是一个定位于纠正市场成本为零的万能的仁慈机构。在一个“天堂模型”(Dennis C. Mueller, 1989)中,政府控制着赋税、津贴和多种资源,实现的是一种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过程。虽然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是一个理性人的观点被大部分人接受,但政府偏好短期政策操作而较少关注长期制度建设的做法仍然是公共政策受到批评的主要原因。在政府生命周期的框架内,这些批评对政府来讲,是勉为其难的。

在模型构建中,我们区别了政府生命周期模型与个人生命周期模型的不同。财政失败是政府失败的充分条件,代理人的行为是即期演化的。政府总是喜欢在其生命周期内财政充裕,政策不受财力的约束以便实现其理想与抱负。但财政压力是随时存在的,不同财政约束下政府考虑的贴现率不同,政府的心理账户也是不同的。财政压力大时,政府一般是执行者(doer),其考虑的是短期收益的最大化。当财力充裕时,政府是计划者(planer),其考虑的是长期收益的最大化。考虑到财政约束的普遍性,可以认为,考虑短期报酬最大化是政府行为的常态。因此,批评公共政策中政府行为的时间不一致性、不可信承诺以及道德风险等如同批评作者不能挟泰山以超北海。因此,公共政策的研究应该是承认政府偏好短期政策操作的特性,并努力寻找出让政府从事长

期制度建设的条件。而且从方法论上讲,人为地把经济分为长期与短期是无意义(Kydland and Proscott,1977)的观点便值得商榷。

(三) 公共政策操作多是“穷则思变”的结果

既然委托人支付的报酬决定了政府的生命周期,而且政府常常追求短期收益的最大化,那么可以认为政府常常是风险最小化的,相应地,其价值函数是凹函数。除非政府的报酬急剧下降,政府才会主动改变政策或者进行重大的变革,此时,政府是风险最大化的,价值函数是凸函数。公共政策操作多是“穷则思变”的结果,这意味着政策的推行多是被动的。即使看似主动的变革,也往往是政府领导人对于财政潜在压力担心的未雨绸缪。出于缓解财政压力考虑的政策变化再次验证了政府行为短期化的判断,并且也可以从中推演出公共政策操作是有次序的结论。

如果将改革看作是强烈的政策操作,那么便可以将公共政策的研究纳入制度变迁的范畴进行考查。财政压力是周期变动的,制度也是周期变动的,同时由于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快速进展,因此研究者不仅能从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推导出政策含义,而且新制度经济学有望成为重新评价一些政府行为的理论依据的判断(Stefan, Voigt and Hella, Engerer, 2002)就便于理解了。这样一来,通过财政视角研究政府行为的思路显得更具备可信性。

(四) 权威在公共政策的推行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政府生命周期模型中强调了政府的失败与重生,在这个转折时期,制度往往陷入僵滞状态,而打破僵滞状态是需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以获取超额垄断收益为特征的竞争是一个对抗性的过程,其中,权威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权威是那些具有超常能力和创造性的人,他们擅长利用竞争过程来实现自身的目的(Wiser, Friedrich, 1889)。在熊彼特的理论中,自利的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遵循着完全可以预见的路线创造和改变了制度,而这些制度限制了未来的经济行为人,直到前瞻的、创造性的领袖能够再一次打碎现存模式并变革制度。权威在制度僵滞的时候出现,进行集中决策可以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随着制度僵滞状态的走出,权威的角色也应该进行变换。

强调政府生命周期中权威的作用,实质是对经济人同质的经济学基本假定的否定,也是对无论是在私人的还是集体的行动中,有目的的个人才是基本的决策者的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的认同。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相对集权国家或者正陷入制度僵滞状态政府公共政策的研究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四、结论及可能的扩展

本文对政府生命周期模型的描述,目的仅在于通过一个纯粹经济学的视角来考察建立在动态基础上的政府行为。以契约论为出发点,将政府视为一个与穷人集团、富人集团博弈的代理人。财政过程的结果是,政府公共政策引

发不同利益集团财富的分化并影响到其创新能力的变化。政府报酬变化的结果是财政失败引致政府失败,在权威的作用下,新的财政过程引发政府重生,并且这个过程周而复始。

从政府生命周期模型出发,我们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重新阐释。本文分析了公共政策的实质是权利分配的观点,并且从模型中推演出政府偏好短期政策操作的基本结论。在坚持公共政策操作多是“穷则思变”的基础上,将公共政策的分析纳入了制度变迁的框架,并且强调了权威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独特的作用。这些分析强调了财政是决定政府行为的核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共政策推行中对政府行为不客观的批评。

如果认同科斯所讲的政府实际是一个超级企业的观点,那么,本模型可以用于对企业管理层行为的分析。特别是企业陷入危机时,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类似于本文中权威的角色。如果将本模型放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考察,则它对于制度变迁,特别是对王朝更替过程的探讨可能更有针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更像是一个关于经济史的研究思路。

本模型出于简便的考虑,对一些经济行为进行了极端的假定。比如,穷人创新动力总是大于富人的假定并不总是成立;政府在财政失败的过程中总是偏好富人,而在财政重生中总是偏好穷人的假定有些机械。虽然放松这些假定并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但这可能会影响到模型的完美性。

注释:

①虽然奥尔森(Olson,1993)认为政府是流寇变为坐寇的过程,契约论并不是政府成立的理由。列宁也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政府只是其中的代理机构而已。但是随着专制的政府向民主政府的过渡,将政府理解成为一个由不同利益集团委托的代理者更符合大众的观点。这显然是一种契约的观点。作为政府分配的工具,将财政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显然更容易理解。即使是在流寇变为坐寇的过程中,财政依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流寇获得的是一次性收入,坐寇获取的是经常性收入。

$$\begin{aligned} \textcircled{2} \text{Limit}_{T \rightarrow \infty} g_3^T &= \frac{N_1}{N_3} v_1 \left[\frac{(1-\alpha)(t_1+e_1)}{1-(1-\alpha)(1-t_1-e_1)} - 1 \right] + \frac{N_2}{N_3} v_2 \left[\frac{(1+\beta)(t_2+e_2)}{1-(1+\beta)(1-t_2-e_2)} - 1 \right] \\ &- \frac{N_1}{N_3} \theta \left[\frac{(1-\alpha)(t_1+e_1)}{1-(1-\alpha)(1-t_1-e_1)} (T-1) - 1 \right] + \frac{N_2}{N_3} \epsilon \left[\frac{(1+\beta)(t_2+e_2)}{1-(1+\beta)(1-t_2-e_2)} (T-1) - 1 \right] \\ &- \frac{1}{N_3} C + \frac{1}{N_3} B_T \end{aligned}$$

经较长时间后,当穷人集团和富人集团的创新系数都趋向于0,制度陷入僵滞状态。可

以证明:当 $\alpha \rightarrow 0$ 时, $\frac{(1-\alpha)(t_1+e_1)}{1-(1-\alpha)(1-t_1-e_1)} - 1 \rightarrow 0$, $\frac{(1-\alpha)(t_1+e_1)}{1-(1-\alpha)(1-t_1-e_1)} (T-1) - 1 \rightarrow$

$+\infty$ 。当 $\beta \rightarrow 0$ 时, $\frac{(1+\beta)(t_2+e_2)}{1-(1+\beta)(1-t_2-e_2)} - 1 \rightarrow 0$, $\frac{(1+\beta)(t_2+e_2)}{1-(1+\beta)(1-t_2-e_2)} (T-1) - 1 \rightarrow$

$+\infty$ 。财政过程初期富人集团和穷人集团共同为代理人的报酬做出贡献。而在 T 时期代理人报酬的边际贡献完全来源于富人集团。由于富人集团是小集团,具有极强的谈

判力量, t_2 与 e_2 最终将会接近于零, 因而, 政府作为代理人的报酬达到最小化, 于是得到上面的结论。

$$\textcircled{3} \lim_{T \rightarrow \infty} g_3^T = \frac{N_1}{N_3} v_1 \left[\frac{(1+\alpha)(t_1+e_1)}{1-(1+\alpha)(1-t_1-e_1)} - 1 \right] + \frac{N_2}{N_3} v_2 \left[\frac{(1-\beta)(t_2+e_2)}{1-(1-\beta)(1-t_2-e_2)} - 1 \right]$$

$$+ \frac{N_1}{N_3} \theta \left[\frac{(1+\alpha)(t_1+e_1)}{1-(1+\alpha)(1-t_1-e_1)} (T-1) - 1 \right] - \frac{N_2}{N_3} \epsilon \left[\frac{(1-\beta)(t_2+e_2)}{1-(1-\beta)(1-t_2-e_2)} (T-1) - 1 \right]$$

$$- \frac{1}{N_3} C + \frac{1}{N_3} B_r$$

。财富变化的结果使得富人集团与穷人集团的创新系数反方向变化, 极端地假设 $\alpha \rightarrow 1, \beta \rightarrow 0$, 穷人集团对代理人报酬的贡献率将趋向于 1, 因此结论成立。

参考文献:

[1] 斯密德. 财产、权力和公共选择[M]. 上海: 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26~28.
 [2] 科斯. 契约经济学[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56~58.
 [3] 卢梭. 社会契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49~53.
 [4] 曼库尔·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上海: 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3~5.
 [5] 朱光华, 魏凤春. 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与所有制改革[J]. 财经研究, 2003, (9): 1~5.
 [6] Hersh M Shefrin, Richard H Thaler. The behavioral life-cycle hypothesis [J]. Economic Inquiry, 1988, 26: 609~643.
 [7] Nordhaus W. 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5, 42: 169~90.

Government Life Cycle Model

—Restatement of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Public Policy

WEI Feng-chu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government life cycle model by describing the fiscal process of the game among the poor, the rich and the agent group under the framework of contract in the view of public finance. On the basis of that, we restat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draw some conclusions, that is to say, (1) the essence of public policy is property distribution; (2) governments prefer to short-term policy manipulating; (3) public policy is mostly the result of change triggered by poverty; and (4) authorities play a predominant role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 policy. This model, at last, is expanded to the analysis of the entrepreneur life cycle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economic history.

Key words: government life cycle model; public finance; public policy

(责任编辑 金 澜)